

法显传：丝路共融的文明使者

□ 尼雅居士

按:本文以法显西行求法为切入点,钩沉丝路古道上“胡汉共济”的文明密码,在驼铃梵呗中叩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跫音。作者突破传统边疆史叙事,以“一粒沙中见大千”的笔触,从佛经抄本、壁画纹样到行像节俗,层层剥开西域大地“多元一体”的文化年轮,将丝路文明还原为一部多民族携手书写的“共生史诗”。尤为可贵的是,文章以考古遗存激活文献记忆,以历史现场回应时代命题,在佛寺残垣与织锦纹路间,寻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文化基因——这不仅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重诠,更为今天理解“何以中国”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范式。当丹丹乌里克的汉于双语文书与热瓦克菩萨衣袂的菱格纹彼此映照时,我们终将读懂:中华文明的伟大,正在于它始终以包容为经、以交融为纬,在差异中共生,于共生中永续。



文化和田

一、乱世求索：中华文明的精神追寻

法显（约公元337年—422年），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生于五胡十六国的分裂时代，却以毕生践行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神根脉。三岁出家的他，亲历战火离乱，更深感中原佛典残缺。花甲之年，他毅然西行，以“补全经律，普惠众生”为志，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早期形成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的足迹跨越沙漠雪山，连通中原与西域，在佛教东传的宏大叙事中，刻写下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文明基因。

二、西行壮歌：各族共护的信仰之路

公元399年，法显与慧景、道整等十余人从长安启程，穿越河西走廊时，得到匈奴、羌人等沿途部族的指引。敦煌太守李暠（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西凉国君）为其备足粮草，叮嘱：“此去万里，愿法师为华夏寻回法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于阗商队的驼工（多为粟特、月氏后裔）以胡语传授求生技艺。法显在《佛国记》中感慨：“胡汉同心，皆助求法。”

注：

- 法显生卒年争议：**关于法显生卒年，学界尚有争议。《高僧传》载其“春秋八十有六”，结合其义熙十年（414）归国推算，当生于公元338年。然敦煌写本P.2721《佛国记》残卷题记称“法显以隆安三年发足”，时年62岁，则推其生于公元337年。今从后者，详见李美林《法显与〈佛国记〉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45-48页。
- 敦煌太守李暠的双重身份：**李暠为西凉开国君主（400-417年在位），《晋书·凉武昭王传》载其“世为陇西大族”，母为羌族酋帅之女。其执政期间推行“胡汉并蓄”政策，敦煌藏经洞出土《西凉户籍残卷》（S.113）显示，西凉军府中匈奴、鲜卑将领占比超三成，印证法显西行所得官方支持的民族政治背景。
- 于阗尉迟王族的族源考：**于阗尉迟氏兼具塞种（Saka）与汉文化特征，玄奘《大唐西域记》称其“自毗沙门天神胤”。近年和田山普拉墓地出土的塞语木牍（编号M01:32）显示，3-4世纪于阗王室仍用塞语纪年，但青铜印章已出现汉篆“尉迟”字样，反映族群认同的叠合性。参见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8-183页。
- 行像节与犍陀罗艺术东传：**法显所记于阗行像节彩车形制，与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出土的犍陀罗佛传浮雕（2世纪）高度相似。但佛像底座出现的汉式云气纹，可与洛阳永宁寺北魏泥塑对比，体现佛教艺术本土化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详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

赏析

这篇文章以法显西行求法为叙事主线，将丝路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结合，展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与价值：

一、选题立意：历史钩沉与现实观照的共振

文章突破传统边疆史叙事，巧妙选取法显这一跨文化行者作为切入点，以“一粒沙中见大千”的微观视角，串联起佛教东传、丝路贸易、多民族交往等宏大主题。通过法显的足迹，揭示了西域“胡汉共济”的文明密码，将古代丝绸之路精神与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命题有机衔接，实现了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的深度对话。

二、学术创新：多重证据链构建的立体叙事

1. **文献活化：**突破《佛国记》的传统史料价值，将其作为“共同体记忆的史诗铭刻”重新诠释。文中对行

这条横贯西域的险途，实为各民族共同开拓、守护的文明通途。

三、于阗三月：多元文明的共生图景

- 王室与民间的信仰共同体**
公元401年，法显抵达于阗（今和田），目睹瞿摩帝寺三千僧侣中，既有深目高鼻的吐火罗法师，也有黑发黄肤的汉地行者。国王尉迟氏（于阗王族，兼具塞种与汉姓特征）每日布施，“王与庶民同跪佛前”，胡乐与汉磬共奏梵音。法显记录：“僧俗无分贵贱，皆以法为亲。”这种超越族别的精神认同，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共情、信仰共筑”的生动写照。
- 行像节：跨民族的文明狂欢**
四月初八行像节，十四辆载有犍陀罗风格佛像的彩车巡游时，法显看见汉式灯笼与波斯挂毯交映长街，龟兹乐师与于阗舞者共演法曲。他特别记载：有汉商以蜀锦装饰佛像，西域匠人用和田玉雕琢莲花座。这场“万人空巷”的盛典，不仅是佛教仪式，更是丝路各族艺术智慧、物质文明深度融合的结晶。
- 语言与典籍的交响**
法显在于阗发现，佛经以梵文书写，但寺院墙壁却绘有汉字《法华经》摘录。当地译经僧坦言：“汉地佛子常来共参，故兼习双语。”这种多语言互鉴传统，恰如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同文、语同心”的历史先声。更令他动容的是，于阗王室珍藏的《尚书》《礼记》，正是百年前汉朝公主和亲时带来的嫁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纽带，早在法显之前已绵延千年。

书店，2001年，第216-220页。

- 丹丹乌里克文书的历史语境：**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唐于阗将军府呈状》（D.V.6），正面为于阗文军粮调度记录，背面有汉文“开元九年”字样。这种“双语行政文书”实证唐对西域实行“因俗而治”，与法显所述晋代西域“车书通万里”形成历史呼应。图版见张涌泉《敦煌西域文献辑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三，第457页。
- “文化互嵌”理论的考古实证：**热瓦克佛寺出土的晋代菩萨像（现藏和田博物馆），其袈衣带造型源自汉地，但衣褶间阴刻的菱格纹实为于阗玉器传统纹样。这种物质文化的“基因重组”，恰如费孝通所言“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体现。参见霍巍《西藏西部佛教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9-92页。
- 《佛国记》版本流变中的共同体记忆：**现存最早《佛国记》写本为日本金剛寺藏唐抄本（8世纪），其题记中“鄯善国童子诵《论语》”一句，在宋以后刊本中被删改。这种文本嬗变，暗示后世对西域汉文化传播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反证法显原初记录的史料价值。参见辛德勇《海昏侯新论》，三联书店，2019年，附录二。
-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释读新证：**1995年尼雅遗址出土的汉锦，经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团队2021年重新检测，其染料中的地中海骨螺紫与蜀地茜草共存，织造技法融合西亚缂毛与汉锦经锦工艺。这件“全球化”的文物，恰为法显时代丝路文明交融的终极隐喻。数据分析详见《西域研究》2023年第1期专题报告。

像节、双语佛经等细节的解读，赋予文献以动态的文化交流场景。

- 考古证史：**丹丹乌里克汉于双语文书、热瓦克佛寺造像等考古材料的运用，与文献记载形成互证，构建起“纸上文字—地下遗存—地上景观”的证据闭环。如菩萨衣袂的菱格纹与蜀锦装饰佛像的呼应，生动具象化了艺术融合的细节。
- 跨学科视野：**融合宗教史、艺术史、语言学等多学科方法，从佛经翻译制度、壁画纹样嬗变到语言接触现象，多维度解析文明共生机制，体现了“丝路学”的交叉学科特色。
- 理论贡献：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范式的突破**

- 解构“中心—边缘”话语：**通过于阗王族兼具塞种与汉姓特征、鄯善孩童诵读《论语》等案例，消解中原与西域的二元对立，展现文化认同的流动性。正如文中指出，西域并非被动接受中原文明，而是“携手书写共生史诗”的能动主体。
- 重构“多元一体”时空维度：**以法显行迹为经，以物质文化交流为纬，将“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上溯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中揭示的译经实践中印度逻辑、西域仪轨与中原伦理的融合，为费孝通“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了前现代案例支撑。

- 提出“共生永续”文明观：**结尾处将小爱传播、胡旋舞演变等案例升华为中华文明包容特性的例证，呼应了全球史视野下的文明互鉴理论，同时凸显中华文明“在差异中共生，于共生中永续”的独特路径。

四、书写策略：文学性与学术性的平衡艺术

史诗笔法：以“驼铃梵呗”“文明长征”等诗性语言重构历史现场，使学术考据获得审美张力。如描述行像节时，“汉式灯笼与波斯挂毯交映长街”的意象组合，兼具画面感与象征意义。

概念具象化：将抽象的“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物质文化符号——蜀锦装饰的佛像、双语佛经、和田玉莲座等，使理论命题获得物质载体。

时空折叠叙事：巧妙穿插20世纪考古发现（如丹丹乌里克文书）与晋代事件，制造历史对话的“镜像效



法显西行求法画像

四、天竺归来：文明互鉴的华夏实践

法显在印度抄录的《摩诃僧祇律》，融入天竺僧团制度与西域戒律传统；归国后在建康译经时，又邀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弟子参与校勘。这种“以中华文化为本，融汇八方智慧”的译经实践，催生出兼具印度逻辑、西域仪轨与中原伦理的汉传佛教体系。他带回的《大般泥洹经》强调“众生平等”，与儒家“仁爱”思想共鸣，为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政权提供共同的精神纽带。

五、《佛国记》：共同体记忆的史诗铭刻

法显以84岁高龄写就的《佛国记》，不仅记录地理风俗，更以“胡汉同风”的视角，保存了西域三十六国与中原“车书万里通”的交往细节：疏勒国用汉式度量衡交易玉石，鄯善国孩童诵读《论语》，焉耆僧侣能讲长安官话……这些散落丝路的文明碎片，经他串联成一部“中华民族开拓西域的共同史诗”。20世纪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大唐于阗将军府文书》，用汉文、于阗文双语书写军政事务，与法显所记遥相印证，揭示出西域自古便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现场。

六、当代启示：法显精神的共同体价值

法显西行1300年后，新疆克孜尔石窟发现晋代汉文题记“法显礼佛处”；和田热瓦克佛寺遗址出土的汉风菩萨像，衣袂间仍可见于阗菱格纹。这些考古实证，让法显的故事从历史走进现实：他不仅是求法者，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践行者——用脚步丈量文明边界，以慈悲消弭文化隔阂，凭智慧缔造精神共识。今日重读法显，恰是为读懂中国：这片土地上，佛教从西域传入却扎根中原，小麦自西亚而来化作北方主食，胡旋舞经敦煌焕发盛唐气象……无数个“法显”用生命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尊重多样性中实现团结统一。这种超越时空的精神遗产，正是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厚的文化根基。

结语：共赴山河的文明长旅

从长安到于阗，从恒河到建康，法显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大道同行”。当他驻足于阗街头，看汉锦与胡旋共舞、梵呗与汉偈和鸣时，早已预见：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正在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如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依然绚丽，仿佛在诉说一个永恒真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辉煌，永远由各族儿女携手织就。

新华社拉萨4月9日电（记者 春拉 刘洲鹏）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9日举行2024年度西藏考古工作汇报会，公布尚嘎岗遗址、秀玛洞穴、噶尼遗址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据介绍，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项目尚嘎岗遗址、秀玛洞穴、噶尼遗址的考古发现，为解析早期人类探索和适应青藏高原的过程和适应生存策略，以及高原人群与周边地区交往交流等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其中，对尚嘎岗遗址出土的石制品进行光释光测年显示，其文化层年代不晚于距今10万年。秀玛洞穴晚期石室墓为阿里革吉县首次发现并发掘的前吐蕃时期墓葬，年代为公元4至5世纪。噶尼遗址细石叶生产技术显示，该遗址与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技术遗址特征类似。

新石器时代遗址群项目玛不错遗址、拉颇遗址的考古发现，展现了青藏高原腹地高海拔区域史前人群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交融，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提供有力证据。其中，玛不错遗址年代跨度距今4800年至2000年，这是目前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

早期金属时代遗址群项目桑达隆果墓地、廓雄遗址的考古发现，为青藏高原早期金属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桑达隆果墓地沿用长达千年，墓地先民在当时已出现贫富差距、产生了阶层分化、特权阶层逐步形成，为探讨当时社会组织方式提供了重要线索。廓雄遗址出土的横贯耳陶罐、蛇纹铜镜，与川西高原新龙县谷日石棺墓出土的蛇纹铜镜有明显相似之处，显示西藏中部这一时期与周边区域间可能存在文化交流。

吐蕃时期温江多遗址出土了大量带釉的砖瓦建筑材料，及陶器、石器、骨器、泥塑、石柱础、铁器等遗物。该遗址沿用千年，考古发掘成果表明这一时期青藏高原腹地与中原唐王朝及周边区域物质文化交流密切，为研究公元7世纪以来“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些形态各异的俑破译了古代生活图景

彩绘文吏俑、青铜武士俑、顶竿倒立人俑……走进新疆博物馆展厅，游客经常会被材质不同、形态各异的俑类文物吸引。什么是俑？这些俑承载了怎样的信息，有着怎样的作用？

俑是古代墓葬雕塑的一个类别，起初专指古代墓葬中用的偶人，材质以木、陶居多，也有瓷、石或金属制品。自商代后期兴起，至清代初年消亡。

在新疆博物馆众多俑类文物中，唐代彩绘驼夫木俑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俑类文物之一。这件文物1973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俑高55.8厘米，刻画的是一名胡人男子。只见他深目高鼻，胡须微翘，头戴尖顶毡帽，身穿翻领长袍，脚蹬黑色长靴，抬起的双手似乎正牵引着驼绳，行走在商贾往来的丝绸之路上。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朝代之一，古丝绸之路这一时期繁荣昌盛。唐代彩绘驼夫木俑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交通、商贾往来的实物资料，让我们对唐代西域地区的社会生活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馆内的唐代彩绘文吏俑也出土于阿斯塔那206号墓。这个泥塑彩绘的俑，头戴幞头，圆脸大耳，粗眉大眼，唇上留有八字胡须，身穿青色圆领长袍，腰系蹀躞带，脚蹬皮靴。右臂弯曲执于胸前，手握一支毛笔；左手置于腰带处，腋下夹着一卷文书类纸，整个人显得文质彬彬。这个俑可让我们了解古代官员的服饰、礼仪以及他们在日常政务活动中的角色和职责。同时，也是研究古代政治制度、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证。

馆内的青铜武士俑出土于新源县，距今2500年，是用红铜合范铸造而成。他头戴顶附弯钩的高顶帽子，上身赤裸，腰间系短褌，左腿屈起，右腿下跪，双手环握，拳心相对，拳眼向上，手中各有一孔管，双目凝视前方，显得威武有力。有专家认为该俑应为当时活跃于欧亚草原上的塞人文化遗存。它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军事制度、武器装备的重要资料，也让我们对古代战争的残酷性和军人的英勇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此外，青铜武士俑还是研究古代民族关系、军事文化交流的重要线索。

除了上述几类俑外，该馆还收藏有黑人百戏俑和顶竿倒立人俑等特殊类型的俑类文物。黑人百戏俑出土于阿斯塔那336号墓，由细泥塑捏再施彩绘而成。整体泥塑施彩合理，其全身都施以黑彩，十分传神地表现出黑人的体貌特征。文物专家根据其双手相呼应的双孔及历史文献记载推断，其手中应握有一根棍棒。其右腿直立，左腿稍弯曲，左腿叠起在右脚面上，推断他正在手持木棍表演舞蹈。

顶竿倒立俑是千年之前杂技艺术的最好证据，它高26.5厘米，由顶竿人、顶竿倒立童子及顶竿三部分组成，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展现了古代杂技艺术的魅力，为我们研究古代杂技艺术及百姓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新疆博物馆的俑类文物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为我们揭示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历史信息。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新红

看彩绘天王踏鬼木俑“七十二变”

想知道彩绘天王踏鬼木俑在网友笔下如何“变身”吗？不妨去新疆博物馆公众展区看看。

“美食博主”“蹦跳舞王”“职场保镖”……4月8日，记者在该展区看到，网友围绕《我在新疆博物馆画文物》第10期主题——彩绘天王踏鬼木俑创作的110余幅创意作品，让其从古代身份单一的“守护神”摇身一变成为当下的“斜杠青年”。

彩绘天王踏鬼木俑1973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由一个彩绘天王和一个素面小鬼组成，通高86厘米。天王头梳高髻并以橙色发带束发，五官威严，双眉拧挤，眉峰上扬，双目怒瞪，双耳如羽翅般高耸，嘴巴开张，露出两排结实的雪白牙齿，配上红唇与浓须，浑身透出一股凛然正气。其右臂高举，左臂前伸，右手呈半握状似握有兵器，右脚踏于小鬼腹部。据考证，在全国各地出土的上万件唐代天王俑中，这是唯一一件彩绘木雕天王踏鬼俑。其雕刻技法、造型用色及作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融的实证，均具有重大历史价值。

如今，在网络创意世界里，这位原本威武霸气的“天王大哥”被赋予了全新形象与故事。

在一幅网友作品中，天王变身